

“缺场”中的成长 ——现代化背景下农村女大学生的童年留守体验

■ 肖妙雨 程 猛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三小学,北京 100091;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北京 100875)

【摘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量农村人口为提高经济收入选择进城务工,“留守”成为千百万农村儿童共有的童年经验。通过对10位在重点大学就读的农村女大学生的童年留守体验及其影响进行深度访谈,本研究意在探究留守经历对个人成长的长期影响。研究发现,在时空被高度压缩的成长历程中,她们与父母的情感关系较为淡漠,体尝着“入不了心”的爱,形塑了“独立”与“脆弱”并存的性情特征。尽管她们心中有怨念,却又无从指责,真实情绪的掩饰与压抑灌注在个人性情之中。留守所带来的亲子关系的张力和困境对农村女大学生的性情养成产生了复杂影响。

【关键词】现代化 童年留守体验 女大学生 时空压缩 脆弱性

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快速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大量农村人口为提高经济收入选择进城务工,与之相伴而生的是作为“城市化的孩子”^[1]的流动儿童和规模庞大的农村留守儿童。规模庞大的农村留守儿童群体中有许多如今已长大成人,“留守”只是其生活史中的阶段性状态,这揭示了留守儿童特征和境况的复杂性^[2]。虽然已有不少研究关注留守儿童问题,但缺少对于该群体成长体验及留守所造成的长期影响的探究。相较于对未接受高等教育而提前进入城市务工的留守儿童的探讨,学界较少关注学业表现优异、接受高等教育的留守儿童。同时,相较于留守男孩,农村留守女孩在“男孩偏好”较为突出的乡土社会更容易遭受区别对待。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一部分农村留守女童得以考入重点大学。在高学业成就耀眼的光芒下,曾经留守的经历似乎已成为过去,但其长期影响始终存在且不容忽视。

基于此,本研究以在童年有留守经历、考入重点高校^①就读的农村户籍女大学生作为研究

收稿日期:2024-09-08

作者简介:肖妙雨,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三小学教师,主要研究家庭教育、教育社会学与教育人类学;

程 猛(通讯作者),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副教授、副院长,仲英青年学者,主要研究教育社会学与教育人类学、家庭教育、教育管理与教育政策。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2年度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一流学科培优项目“现代化视野下精英高校大学生情绪困扰的教育人类学研究”(课题编号:YLXKPY-ZYSB2022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本文中“双一流建设高校”。

对象。她们的诸多特征,如“童年留守”“农村户籍”“重点高校”“女大学生”已经显现了其特定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经历。在我国长期的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村户籍”标示着她们的家庭经济社会背景,“童年留守”指向了其父母离乡务工导致的亲子分离的成长处境,“女大学生”则意指其成长环境中的社会性别结构与文化观念,进入“重点高校”就读则显示了学校教育在她们的生命轨迹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她们自身的能动性。本研究试图探究的两个问题是:她们有哪些独特的留守记忆和家庭生活体验?进入重点高校后,来自过去的留守体验会如何展露出痕迹,又会产生哪些长期影响?

一、关于“留守体验”的文献述评

以传统生活中具有稳定的社会抚育作用的双系抚育结构^[3]为分析框架,已有研究探讨了留守儿童家庭在双系抚育结构被破坏后所采取的应对性抚育策略:依靠农村家族成员帮忙照料^[4],按照学校教育的时间表做出双系生活抚育、单系社会抚育策略调整^[5]等。为维持在城市务工的生活及家庭的再生产^[6],农民工家庭在户口制度与城乡二元分割的制度背景下,面对市场与制度资源均较为匮乏的不利处境,只能无奈选择“拆分型家庭模式”^[7]。研究表明,亲子分离使得亲子关系易出现残缺或者断裂,从而引起家庭情感功能弱化和家庭教育功能受损^[8],并带来留守儿童的“心理留守”问题^[9]。

有研究指出,留守儿童存在积极情感体验不充分、负面情绪表达受阻、应激情感沟通不畅^[10]等情感问题。“孤独”和“渴望”是被留守儿童暂时或长期“隐忍”的情感体验^[11]。有研究者认为,留守儿童的情感缺失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之痛^[12],父母的缺席与情感忽视导致留守儿童出现焦虑、自卑和被边缘化等情感枯竭状态,并且这种消极情感体验存在代际传递现象^[13]。在亲子关系方面,留守儿童基于自身视角形成“亲代在位”的认知图式^[14]以及矛盾的“爱而不亲”的亲子关系体验^[15]。有学者探究了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与其父母的关系修复问题,指出无法修复的亲子关系与过早且长期的亲子分离、亲子互动中情感支持不足、缺乏有效的亲子沟通模式紧密相关^[16]。

一些研究者从心理学角度探究了留守儿童的性格特征、亲子依恋类型、自我意识与人际交往模式,指出留守儿童性格更为内向,不轻易表露内心的想法和情感,情绪更为淡漠、消沉^[17],易产生自我孤独感与社交回避问题^[18]。依恋理论指出,母亲作为婴儿的主要照护者,其与婴儿建立的安全依恋关系,具有“安全探索基地”的作用^[19],能够培养亲社会的动机和态度,促进个人发展并增进关系^[20]。关于亲子分离的长期影响,有研究表明,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具有自我评价低、情绪不稳定、人际交往退缩、心理发展不平衡等特点^[21],低质量的亲子关系与家庭归属感的缺乏致使其产生心理健康危机^[22]。

二、研究视角与方法

时间是讨论留守经历及其影响的关键维度。对于农村女大学生来说,留守体验虽然发生

在过去,其影响却嵌入当前的生活。生命历程理论最核心的思考维度是时间,即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发生在“一定时空中”,“人在哪一年出生和人属于哪一个同龄群体基本上将人与某种历史力量联系起来”,“某一生活事件在何时发生甚至比这一事件本身更具意义”^[23]。因此,生命历程的理论视野与讨论留守经历的长期影响是契合的。与此同时,与中国的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相伴相生的留守经历并不只是个人层面的体验,也关乎社会发展中的结构转型和文化转向。在保罗·威利斯(Paul Willis)看来,超大规模的由乡入城的人口流动是中国的特殊现象,而“城市崇拜”是中国文化现代性的突出特点之一^[24]。作为“城市化的孩子”,留守儿童体尝着一种特殊情境下的中国现代性。由此,在对留守体验的研究中,关注她们的心理、情感与道德经验,描摹其留守记忆深处隐匿的现代性踪迹,可以窥见现代化进程中普通中国人的观念与行动策略。此外,这里所研究的农村女大学生的留守经历也指向了其性别特质。贺萧(Gail Hershatter)在《记忆的性别》中指出,记忆是一个社会过程,受到不容忽视的、性别的社会差异的影响^[25]。因此,在研究中也需要特别考虑农村女大学生的留守经历对其性别社会化所产生的影响。

在资料收集过程中,我们通过滚雪球和网络平台招募等方式邀请了10位户籍在农村、父母均外出打工的重点大学女大学生进行深度访谈。在研究过程中,对每位访谈对象进行1-3次访谈,每次访谈时间1-2小时,力求完整、深入地记录她们的留守体验。访谈对象具体情况见表1。

表1 访谈对象基本情况

化名	出生年份	籍贯	留守时段	父母学历	与父母沟通联系频率	替代照料者	与替代照料者的互动交往
欣欣	2000	江西	2-7岁、7-17岁	小学	周末电话沟通,寒暑假见面	祖母	祖母照料欣欣的吃穿住行
卢安	1998	四川	2-5岁、7岁、12-17岁	初中	较少,寒假过年见面	祖父母	祖父母照料卢安的吃穿住行,相互陪伴
岚兰	2001	湖北	3-10岁	初中	较少	祖母	祖母照料岚兰的吃穿住行,并管教其学习
橙子	2000	吉林	12-17岁	初中	周末电话沟通,两到三周一次	多个姨妈	姨妈们轮流照料橙子的吃穿住行
青橘	2000	重庆	14-15岁	初中	周末电话交流	姨妈	姨妈照料青橘的吃穿住行
高越	2002	安徽	11-17岁	初中	周末视频交流,寒暑假见面	姑妈	姑妈照料高越的吃穿住行,只有一个儿子的姑妈把她当女儿一样对待
方秋	2002	河南	4-16岁	高中	周末电话沟通,寒暑假见面	祖父母	照料吃穿住行,曾与祖母发生矛盾
小又	2005	四川	10-16岁	小学	每周一次电话	外祖母	周末外祖母照料吃穿住行,代沟大,交流较少
小钰	2004	江西	2-5岁半	初中	较少	祖父母	吃穿住行照料,偶尔跟祖母吵架
蓝桉	1998	山东	5-6岁	高中	较少	祖父母	照顾起居,但祖父母重男轻女观念较重

马克斯·范梅南(Max van Manen)认为“生活经验是现象学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通过“将生活经验的实质以文本的形式表述出来”,“文本的效果立刻成为有意义事物的重新体验和反思性拥有”^[26]。本文采用现象学取向的叙事研究范式。在研究过程中,主要采用情境分析^[27]的方法对访谈资料进行分类,以“家人关系”“成绩”“情绪”“关键事件”“性格”等关键的意义符号入手,分析这些女大学生的留守经历如何嵌入其家庭生活和学校生活之中,又对其性情和人格养成产生了何种影响。

三、关于留守体验的两类记忆

与父母较早且较长时间的分离生活是留守儿童的独特成长经历。在留守的时间里,她们与家人的相处细节与关系感知是探究其独特家庭生活体验的重要窗口。

(一)近处的家与遥远的父母:忙碌、忽视与放养的记忆

对于留守的孩子来说,父母远在外地务工,处于学龄期的她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上学,亲子相聚主要依赖寒暑假等制度性时间安排。亲子分离构筑了彼此不同的生活时空,也带来了家庭抚育策略的调整与适应。流动到异乡的父母需要依靠家族成员帮助他们抚养孩子,这改变了儿童与父母朝夕相处的成长环境。较长的亲子共处一般发生在学校放寒暑假时,平时多通过电话联系。幼时长期与父母分离使她们对父母的记忆陌生而又模糊,只能在短暂的相聚时光中形成具体印象。一些访谈对象小时候有随父母一起外出流动的经历,先是流动儿童,后来再成为留守儿童。记忆中的父母都非常忙碌,无暇关心她们。

我觉得他们对我关心很不够。因为从我上小学开始,他们就很忙,没什么时间管我。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爸爸只会做土豆,炒土豆片、土豆丝。有一阵我妈一直加班,我吃了一个月土豆,轮着吃土豆炖鱼、土豆丝、土豆片、土豆块。不是我开玩笑或者讲笑话,周日的时候我们会成箱成箱地搬泡面。他们也没空听我说一些在学校发生的事情。(橙子)

我妈特别忙,所以到他们那之后(指与父母一同外出流动),感觉跟他们感情也没有特别深。(岚兰)

欣欣并没有随父母外出流动过,她和哥哥暑假会去父母那边,寒假父母会回乡过年。欣欣记忆中的父母很少陪伴自己,与自己交流不多,平时打电话的聊天内容常常是重复的叮嘱,“好好读你的书,其他的不要管,你们^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欣欣在访谈中也表达了对父亲不耐烦、不愿意花时间在自己身上的不满,彼时愤怒的情绪到现在才被有意识地叙述出来。

他对我们说白了就是没有耐心。他可以给我们花钱,但是不能花时间,花一些他认为没有意义的时间。……我甚至会非常生气地想,宁愿不让他们出去,不要他们给我更好的物质生活,也要让他们待在我身边。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过,也没有跟他们说过。那个时候,我其实内心非常愤怒。(欣欣)

随着时间的流逝与年龄的增长,亲子分离引发的失落会更加明显。如果是多子女家庭,只有自己留守,更会激起年幼时的她们对父母不在自己身边的疑惑和不满。卢安性格敏感细腻,

^① 指欣欣和她的哥哥。

是家中第二个女儿,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从她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她对父母给予精神支持与关怀的渴望,但父母不仅无暇关注和满足她的内心需求,还要求她照顾妹妹。

那个时候我印象最深的感觉就是,父母从来没有关照过我,而我却要去承担为人母的角色^①。其实对我来说这是特别不公平的,我从来没有被当做一个小孩那样被照顾过、爱护过,这是我人生永远的一个缺失。(卢安)

当回忆与父母相处的细节时,她们的叙述隐藏着不满的情绪,常提起“孤独”“缺少关爱”“盼而不得”的感受。尽管她们希望父母能够给予更多的关怀,也希望能与父母有更亲密的情感联结,但亲子之间的物理距离、父母体力劳动的疲惫让这一切都很难实现。这些无法被满足的情感需求并不能简单地用父母失职来解释。当父母迫于生存压力而外出务工,而与户口相关联的教育体制不能支持流动儿童在当地入学,父母与子女只能两地分隔。长期分离使得亲子之间无法拥有“培养熟悉和亲密关系所必需的共同生活”^[28],亲子间直接的情感交流时间因物理空间的限制而被压缩。

从文化与社会变迁的角度来看,沉默、内敛与重行动的教养习性是很多农村父母的养育特征。对于流动在外的父母们来说,他们的养育方式也难免带有传统的乡土底色,吃穿住行与学费的满足即是照料。费孝通指出,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家是一个“绵续性的事业社群”,而事业不能脱离“效率的考虑”,因而讲究纪律、排斥私情、感情淡漠“是稳定的社会关系的一种表示”^[29]。阎云翔则探讨了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中国农村家庭的转型过程。他认为,此时的家庭已经逐渐演变为“私人生活的中心以及个人的避风港”^[30]。但对于外出打工的农村家庭而言,亲子分离似乎也塑造了新的家庭分工模式,即父母为生存和养育子女而拼搏,子女则“负责”专心读书。不过,流动进城的父母为谋求生计需要进行繁重的劳动,少有空闲向远隔千里的孩子表达体己的关心。在访谈对象的回忆和叙述中,不难感受到她们与父母对彼此生活情境的陌生。正是在这种父母缺场、彼此交流总隔着一层的处境下,她们一点点地长大。

(二)替代照料与情感挤压的记忆

面对随迁子女在城市无法长期就读的困境,在外打工的父母往往会安排孩子留在家乡上学,学校生活之外的衣食住行就需要依靠家乡的家族成员帮忙照料。替代照料者充满温情与爱心的陪伴和关怀,可能会弥补她们内心的缺憾。

我大姑也是比较好的人。她不像传统的农村大妈那样斤斤计较,她不是那种人。我大姑只有一个独生子,所以把我当成她自己的女儿一样对待。(高越)

不过,并非所有的留守儿童都能得到替代照料者的悉心关爱。孟亚男、张璨的研究发现,留守儿童容易缺少正常家庭的情绪疏导渠道与互动机会,还要在替代抚养家庭中表现出“懂事”“担当”的形象^[31]。橙子回忆寄住在亲戚家时,面对一大家子亲戚,自己是小孩中唯一一个“比较懂事”、会主动帮大人忙的。“懂事”成为她在家族里的一个标签,而这种“懂事”的背后是她懵懂地察觉到自己寄人篱下的处境,学着压抑自己真实的情绪、需求、愿望与表达,在心理上不想给他人添麻烦的一种外在表征。

在与替代照料者相处时,一旦产生矛盾,因为这种懵懂的“懂事”与敏感,她们往往会掩饰

^① 指照顾自己的妹妹。

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和情绪去满足他人的需求,“无力”与“没有位置感”便会悄然产生,进一步形塑了压抑真实情绪的习惯。此外,因为长期分离,她们从父母那里得到的情绪支持较少,情感互动的体验也比较匮乏,久而久之亲子之间形成了淡漠的情感状态。

上初中时我就挺敏感,我会因为她(指姨妈)的一些眼神和行为而反思自己哪里做的不对,然后尽可能地调整。我在这个过程中很小心,但表面上要表现出一副高兴的样子。(橙子)

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负面影响,就是我会对父母隐藏自己的情绪,自己不开心的时候不会告诉他们。(方秋)

我感觉我跟我妈的关系挺奇怪的。即使我们待在一起也很少说话,总感觉有什么东西挡在中间,没有办法深入交流,但是日常生活中我们表面上相处得还挺和睦的。(欣欣)

在亲子分离的成长情境下,她们常处于压抑或敏感的情绪状态之中,懵懂地以“懂事”小心地应对亲子分离后的家庭生活。在不同家庭中,亲子分离在不同程度上阻隔了亲子间情感的自然流动,访谈对象与父母之间“爱而不亲”^[32]的亲子关系在成年后也依然延续。

四、留守体验的延续与转化

在进入重点高校后,留守体验并未停留在过去,而是潜隐于她们的记忆,影响她们当下的性情与人际关系。

(一)“入不了心”的爱

在农村地区普遍的文化实践中,对子女的教育支持是一种必要的家庭投资。流动在异乡的父母期盼子女有出息,并在这种期盼中努力劳作供子女读书。父母对子女之爱一旦受制于物理空间,就往往只能以补偿的形式发生,一般在寒暑假集中释放。这种补偿式的、周期式的爱虽然有助于缓解亲子关系的张力,但也往往停留在物质层面,而在精神和心理层面始终有所欠缺。因此,缺场的陪伴以及倍受限制的关爱就成了她们回忆中的隐痛。

我跟妈妈之间的关系是之前一些客观因素造成的,后面其实挺难弥补的。她出去(打工)之前,我跟她关系其实挺好的,我挺依赖她的。她出去之后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就不那么亲她了。她自己也知道,会不高兴,但是平时还是非常照顾我,尤其是我跟我奶奶生活这几年。比如说暑假、过年的时候,我能感受到她非常关心我,尤其是物质方面,给我买很多好吃的、给我买衣服啥的,但就是感觉入不了心。她在尽她最大的努力,似乎想从物质上补偿,但是好像又走不进我的心,或者说我不让她走进我的心……其实生活上她是非常非常关心我的,但是在心理上和精神上,我觉得那种隔阂是很难一时之间就打破的。(欣欣)

这种“入不了心”的爱很难言说,也很难找到缓释的出口,更难以说清究竟是谁的责任。一方面就像卢安所说,“我心里其实是有种‘怨’的,但这个怨永远没有办法说清楚道明白,也没有办法去指责他们,因为毕竟是为了经济对吧?”另一方面,这些农村父母外出务工本身就饱含背井离乡的痛楚、对自身需求的压抑、为家庭所作的牺牲以及对子女的爱,这些情绪很难找到疏解的办法,不表达以及心理上的疏离和淡漠成了一种自然的应对方式。与此同时,子女也在对父母的理解中进一步压抑了内心的真实感受,双方共同形塑了一种相互之间不表达真实感

受的“情绪沉默”,爱“入不了心”即源于此。

(二)“独立”与“脆弱”并存的性情养成

进入大学后,扩大的人际交往使她们意识到自己与他人行为习惯上的差异。对于方秋来说,让她惊讶的是同学可以随意与父母分享挫折或要生活费,这种随意、轻松的依赖让她五味杂陈。小又发现自己与同学的不同在于自己的“独立”,这也让她感受到了自己家庭亲子关系的特殊性。

留守经历的一个影响是,它让我非常独立。就算没有父母,我也可以一个人生活,一个人处理事情,包括做决定。从初中开始,在哪里上学之类的事情基本上全都是我自己决定的。……我妈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她“什么都不懂”。对,可能是学历方面的问题。我的学历比他们高了以后,他们就会觉得他们已经没办法帮到我什么,只能全都交给我自己来决定。(小又)

“自主”与“独立”这两个概念在心理学上是有差异的。有研究指出,自主并不意味着绝对的独立或与家庭的完全分离,只有当父母为孩子提供一个既能表达情感、又具有一定行为指导性的家庭环境时,个人自主才能得到最理想的发展^[33]。相对于独立,自主内生于有支撑性的外部成长环境之中,是一个更值得发展的人格倾向。就本文访谈对象的情况来说,留守经历使得她们大多形成了“独立”的性情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们发展出了良好的自主性。过早且过长时间的留守使得她们不得不在心理层面以敏感或懂事独自应对成长中的各种状况,与父母之间形成不亲近、难沟通的亲子关系。

因为父母没有见证我的那个成长阶段,所以她们对我的了解可能是止于表面的。比如说我成绩怎么样、上的哪个学校,这些东西能够带给他们骄傲感,但是我真正的内在的变化,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心灵上的,他们是不知道的。这就造成了沟通上的壁垒。(卢安)

在长期亲子分离的现实中,留守的孩子逐渐感知到父母也无法帮助自己,只能靠自己。这种独立性可能会形塑自立自强的品性,但在暴风骤雨般的青春期,这种独立性也带有脆弱性与不确定的风险。在对欣欣的访谈中,我们发现亲子分离的现实使她被迫“独立”起来,但她常常感到紧张压抑,“每天都是紧绷着自己的神经”,心理上长期处于紧张、担心的脆弱状态。过往经历所塑造的“独立”性情阻碍了其求助与表达的需求,使得她难以自在地发泄自己的压力、及时调整负面情绪。在亲子关系中,她虽然独立,却并不能自主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说到底,独立的性情赋予了她们的生活以某种平衡,但也意味着信任和依赖的缺失,暗含着一种缺少支持的脆弱性。

(三)“浑身都是刺”:冲突与理解共生

在成长过程中,逐渐长大的留守儿童们能够理解父母操持生活的艰辛与不易,她们与家人的关系也在矛盾与理解的交织中展开。

我感觉也是因为自己长大了吧,也感觉他们赚钱确实不容易。我高考之后在我妈工厂里跟着她工作过一段时间。我妈就是踩缝纫机的工人,那个钱真的就是一分一分赚来的,特别不容易。我爸爸是个货车司机,他那个工作就很没规律性,有时候需要白天去干活,有时候需要熬一整个晚上去干活,颠三倒四的。我就也挺心疼他们,也挺不容易的。(高越)

同时,她们对自身成长情境有意识的反思也影响着自己的生活 and 行动选择。在重新审视留守经历和意义建构的过程中,她们成长中的缺憾得以显露,并获得修复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也充满不确定和风险。

我逐渐尝试去理解他们,或者站在他们的角度来看问题,因为我不希望自己长成一个浑身都是刺儿的人,我希望我依然能很好地接触一些人和事,所以我一直在努力尝试理解。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渐理解了我爸爸,也理解了很多事情。(橙子)

尽管童年缺失的陪伴也可能生长出内心难以消磨的尖刺,为她们的家庭关系蒙上一层不确定的阴影。但是,高等教育开启了个人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她们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独立于传统家庭的成长空间,也由此踏上了一条通过接纳和创造新的关系互动模式来理解和治愈自己的复原之旅。

五、结语

在对自己研究工作的反思中,费孝通认为“见社会不见人”是以往社区研究存在的局限,提倡在关注社会结构之外还应关注社会中活生生的人、关系及心态^[34]。个人体验的叙述是探究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重要路径。通过对有留守经历的农村女大学生成长经历的考察,可以看到她们亲子关系的张力和困境,以及普通人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微观体验。

通过呈现留守体验中的亲子关系与情感演变历程,研究发现,情感忽视与弱陪伴的家庭养育模式对农村留守女童的成长产生了复杂影响,农村父母对于勤恳劳动、物质奖励与子女好成绩这三者关系的线性理解是与儿童的内在情感和心理需求相抵牾的。农村儿童的留守体验源于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持续虹吸。由于进城务工人员社会保障和子女就学保障相对不完善,农村儿童父母“在场”的家庭生活与陪伴被迫中断。亲情“断裂”成为现代化进程的隐藏代价,对留守女童的性情养成产生了复杂的影响。

本研究对公共政策和家庭教育实践有一定启发意义。有关部门应为留守儿童家庭提供有针对性的家庭教育指导,帮助外出务工的父母转变教育观念,注重情感交流,更多倾听子女的内心想法和感受。应倡导转变传统的重男轻女观念,树立性别平等的家庭教育意识,支持农村女童在教育 and 未来发展上的同等权利。此外,针对已经长大、有留守经历的女大学生,高校可在心理健康相关课程 and 活动中设置留守经历主题的工作坊或讨论,帮助她们进行情绪辨认 and 疏解心理困扰,为她们提供支持性的情绪疏解渠道。

本研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的访谈对象都已经上了大学,她们是如何克服亲子分离的不利处境,又如何以坚忍之心持续努力、成功脱离在父母“缺场”中成长所意指的种种陷阱,其中复杂的家庭、学校 and 社会互动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 [1] 熊易寒:《城市化的孩子:农民工子女的城乡认知与身份意识》,载《中国农村观察》,2009年第2期。
- [2] 江立华:《留守儿童问题的建构与研究反思》,载《人文杂志》,2011年第3期。

- [3]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6页。
- [4] 姜又春:《打工经济背景下农村家庭关系的变迁与留守儿童养育模式研究——以湖南潭村为例》,载《西北人口》,2010年第3期。
- [5] 杨汇泉 朱启臻:《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抚育策略的社会学思考——一项生命历程理论视角的个案考察》,载《人口与发展》,2011年第2期。
- [6] 邢成举:《“保卫家庭”:家庭策略视角下留守现象的再思考》,载《江汉学术》,2020年第4期。
- [7] 谭 深:《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研究述评》,载《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 [8] 吕 吉 刘 亮:《农村留守儿童家庭结构与功能的变化及其影响》,载《中国特殊教育》,2011年第10期。
- [9] 赵兴民:《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实质与解决路径》,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 [10] 任 露 毛齐明:《留守儿童家庭情感生活调查》,载《基础教育》,2014年第4期。
- [11] 郑 蕊 周兴国:《留守儿童“隐忍未发”的情感体验:危害与疏导》,载《当代教育论坛》,2018年第5期。
- [12] 陆继霞:《留守儿童情感缺失: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之痛》,载《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 [13][31] 孟亚男 张 璨:《父母情感陪伴缺位对留守儿童的影响——基于留守表述的情感社会学分析》,载《少年儿童研究》,2022年第8期。
- [14] 吴重涵 戚务念:《留守儿童家庭结构中的亲代在位》,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0年第6期。
- [15][32] 肖莉娜:《“爱而不亲”:留守儿童的亲子关系体验与建构》,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 [16] 杜云素:《缺席的父母能否弥补缺席的爱:留守经历大学生亲子关系研究》,载《中国青年研究》,2021年第6期。
- [17] 常 青 夏绪仁:《农村留守儿童人格特征研究》,载《心理科学》,2008年第6期。
- [18] 张婷皮美 石智雷:《父母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载《西北人口》,2021年第4期。
- [19][20] Cassidy, J., Shaver, P. R.. Handbook of Attachment: Theory, Research,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s,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2016, p. 79, p. 515.
- [21] 张莉华:《具有“留守经历”大学生的心理分析》,载《当代青年研究》,2006年第12期。
- [22] 刘成斌 王舒厅:《留守经历与农二代大学生的心理健康》,载《青年研究》,2014年第5期。
- [23] 李 强 邓建伟 晓 箬:《社会变迁与个人发展:生命历程研究的范式与方法》,载《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6期。
- [24] Willis, P.. Being Modern in China: A Western Cultural Analysis of Modernity, Tradition and Schooling in China Toda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20, pp. 1-4.
- [25] 贺 萧:《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张 赞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3页。
- [26] 马克斯·范梅南:《生活体验研究——人文科学视野中的教育学》,宋广文 等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6页。
- [27] 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92-296页。
- [28] Murphy, R.. The Children of China's Great Migr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 p. 218.
- [29]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57-61页。
- [30] 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龚小夏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11-12页。
- [33] 李彩娜 张 曼 冯建新:《家庭功能与社会适应:个人自主的中介作用》,载《心理发展与教育》,2010年第4期。
- [34] 费孝通:《个人·群体·社会——一生学术历程的自我思考》,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

(特约编辑:张 宪)